

萨特在中国的精神之旅

——纪念萨特百周年诞辰

柳鸣九 钱林森

今年6月21日,是法国著名思想家、文学家让-保尔·萨特(Jean-Paul Sartre, 1905—1980)百年诞辰。我国有影响的报纸或大型周刊如《新京报》、《南方都市报》、《经济观察报》、《中华读书报》、《新周刊》、《中国新闻周刊》等,都纷纷发表了专题采访和纪念文章,首都有名的出版社如人民文学出版社、商务印书馆、北京燕山出版社,也先后推出了《萨特文集》、《萨特读本》、《萨特精选集》、《萨特的世纪——萨特哲学研究》等萨特中译著作和萨特研究文集,从学界到媒体到出版界,人们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来怀念这位西方作家,一时间构成了一道纪念萨特的“东方景观”。

在20世纪现代西方作家中,萨特无疑是我国读者最为熟悉的名字之一。早在上世纪40年代,当萨特在故乡声名鹊起的时候,他的一些创作如小说《墙》便由诗人戴望舒等人两度译介到中国。^①50年代,萨特和他的终生女伴西蒙娜·德·波伏瓦应邀访华,我国译界趁势译出了他的剧作《恭顺的妓女》,再后来是他的《存在与虚无》。但萨特真正为我国广大知识读者所知晓、拉手亲近,并对他们的精神命运产生深刻影响的时日,是80年代改革开放时期。发表于本时期的《给萨特以历史地位》和《萨特研究》,是萨特真正意义上进入中国的两座基石:自此,萨特的文学作品、哲学论著和传记种种,便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成为一代青年竞相吸取的精神食粮,萨特本人也成了中国“80年代新一代”的精神伴侣和崇拜的

^① 参见钱林森《法国作家与中国》第九章第二节“危机中的拯救——存在主义作家与中国”,第592页,福建教育出版社,1995年,2000年再版。

偶像,对我国整整一代读者产生了非同寻常的深远影响。在萨特百年诞辰之际,我们感到荣幸的是,请来了中国“萨特研究第一人”、法国文学权威批评家柳鸣九教授,就萨特在中国的精神之旅,进行交流、对话、反思,请他来跟我们讲述“萨特的中国故事”,跟我们一起沿着当年萨特步入中国的历史足迹,重温并共享那远去的、充满激情的美好时光,从而提升我们接受外来文化的精神层面,这也许是本刊纪念这位西方思想家、文学家百年诞辰的一种有意义的方式,希望读者喜欢。

钱林森,2005年8—9月于南京大学

钱林森(下简称钱):在中法文化和文学关系史上,在20世纪法国作家满程风雨的中国之旅中,若以其与近代中国知识界命运浮沉和精神联系之密切而言,因而也最具戏剧性和启发性的,莫过于罗曼·罗兰和让·保尔·萨特的中国之旅了。你作为中国“萨特研究第一人”,作为引领思想家、文学家萨特走进中国的权威学者,能在这位文化巨子诞辰百年之际,就其中国之行的历程、影响和意义,与我们交流、对谈,我深感荣幸和欢畅。欢愉之情,不由得让我忆起当年捧读你写的有关萨特的开山大作《关于重新评价西方20世纪文学的几个问题》和你主编的《萨特研究》的情景……岁月如水,已是二十几年前的事了。时值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时期,中国知识界思想解放的春天,是你首先结识萨特、认识他的价值,并随之将他引入了中国——用你现在幽默的说法,那是你“为萨特在文化上堂而皇之地进入中国代办‘签证’”^①。我们的话题也许该由此切入:能否请你谈谈与萨特“结缘”的来由、理由和背景?以便让我们一起沿着当年萨特东进中国的历史足印,重温并分享那远去的、充满激情和风雨的时光。

柳鸣九(下简称柳):首先,谢谢《跨文化对话》与阁下安排了这次关于“萨特中国行”的访谈对话。

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题目,值得交谈,值得总结。它不仅对我本人很有意义,因为我是一个与此有关的主要当事人,而且对学术文化界也很有意义,因为萨特的中国之行,萨特在中国的被接受史,正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一个重要的精神文

^① 参见《我为萨特在文化上进入中国代办“签证”》,载《南方都市报》,2005年6月20日。

化过程,它反映了中国这个新时期的历史步伐与进展。正如阁下所言,这是一个令人欣慰的过程,值得纪念的过程。在80年代以前,萨特在中国得到极不公正的评价,改革开放伊始,就有了“给萨特以历史地位”的强烈呼声,与对萨特进行全面科学评价的《萨特研究》,然而,这些努力很快就在“清污”中遭到严厉的否定与清算,到80年代中期,又完全“雨过天晴”,时至最近一个时期,萨特的著名哲理“自我选择”已成为了千万中国人常用的口头语,而到了2005年萨特百年诞辰纪念之时,国内有影响的大报与大型周刊如《新京报》、《南方都市报》、《新周刊》、《中国新闻周刊》、《中华读书报》等等,纷纷发表了大篇幅的专题采访与纪念文章,盛况大出人们所料。二十多年来,这一过程,不是很具有戏剧性吗?不是一个很生动很有意义的文化故事吗?它反映了中国历史带有某种螺旋式形态的上升态势,对于一个传统力量特别巨大,而现实负荷又特别繁重的国家,即使是高速发展,往往也不可避免地采取螺旋型前进轨迹。

至于在这个过程中,我在萨特问题上做过些什么,可以说是一个很完整的“故事”,请允许我从头到尾讲一遍。

上世纪70年代最后两年,中国开始有了春天的气息,这股气息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一场讨论带来的。那时,我已完成了《法国文学史》的上卷,正在进行中卷的编写,不久将要面临对法国20世纪文学的评说。但只要一进入20世纪文学领域,就会碰到一座阻碍通行的大冰山:日丹诺夫论断。日丹诺夫是斯大林时期苏联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总管,以在学术文化领域里坚持无产阶级专政而著称,他把20世纪西方文化艺术统斥为“反动、颓废、腐朽”,一棍子打死,他的报告与讲话,从30、40年代引入解放区后,就被视为“马列主义的理论经典”,实际上成为了带有权威指导性的“准文件”,一直到70、80年代,它的权威性仍然巍然未动,只要有这座冰山在,对外国20世纪文学的研究、翻译、介绍就根本无法正常进行,只能一骂了事。

这时,我四十出头,在研究工作岗位上已呆了二十来年,刨去“十年浩劫”,也算有“十年寒窗”的苦读,虽不敢说有多么深的学养,但以自己在西方20世纪文学方面的积累,也深知日丹诺夫论断之有悖于客观实际,而且也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对待文化遗产那种赞赏有加的典范风度。说老实话,我对日丹诺夫的反骨早已有之,就看何时揭竿而起了。“实践检验真理”

那场讨论给了我很大的启发,既然有理由重新审视历史传统了,有理由清除不符合客观实际的时弊与陈词了,当然就到了在外国文学、艺术、文化、学术的领域破除坚冰的时机。问题在于我要把这件事做多,怎么做?

当然,揭竿而起,首先需要有一篇旗帜鲜明、论据充分、有系统、上层次、有学术份量的“檄文”,由于预见到未来的“轰动效应”,我满怀热情地做了这件事,下了不少功夫准备这篇文章。其次就是在什么场合,通过什么方式来宣示这一“檄文”了,正好我当时担任了两个学术职务,给了我甚为广阔的施展空间,一是外国文学研究所西方文学研究室主管科研业务的副主任,一是研究所当时的“机关刊物”《外国文学研究集刊》的“执行主编”,这给我的“三箭连发”提供了便利条件,这三箭就是:

之一,1978年秋,在外国文学第一届全国工作规划会议上作“揭竿而起”的长篇学术发言《现当代西方文学评价的几个问题》,亦即早已准备好的那篇“檄文”,矛头集中指向日丹诺夫论断,并对20世纪西方文学中一系列流派、作家、作品进行了比较深入具体的分析,重新作出科学的实事求是的评价。整个报告很长,共讲了将近两段时间共五六个小时,其中就有相当一部分篇幅是专论存在主义文学与萨特的。这次长篇发言时在座的有外国文学界老、中、青三代几乎所有的著名学者专家,包括朱光潜、冯至、杨周翰、伍蠡甫、覃婴、王佐良、辛未艾、罗大冈等等,报告受到热烈的欢迎,会后,朱光潜将我推到周扬面前加以介绍,并说:“他的报告讲得很好啊。”鉴于这次会议非常重要,因此,这个报告也就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之二,紧接着,将上述报告整理为约六万字的长篇论文,在当时唯一一家外国文学评论刊物《外国文学研究》上发表,分两期连载。

之三,在我主持工作的《外国文学研究集刊》上,有计划组织了、刊载了题为《外国现当代文学评价问题的讨论》的一系列笔谈文章,扩大“揭竿而起”的声势与影响。

坚冰已破,从1979年后,国内书刊纷纷译介并正面评价西方20世纪文学,蔚然成风。

1980年,萨特逝世,我在《读书》杂志上发表了悼念文章《给萨特以历史地位》,进一步发挥了上述“檄文”中论述萨特的观点,这是社会主义中国第一篇对

萨特进行了全面的、公正的评价的文章,因为是针对国内长期对萨特的极为不公正的评价,所以写得颇有挺身而出,为君一辩的激情与大声疾呼、申诉鸣不平的姿态。

三箭齐发,必然引起巨大的反作用力。在意识形态领域里,以维持精神道德秩序为己任,惯于批点挥斥者不乏其人,就在上述“檄文”发表的第二年,即1980年,在外国文学研究会第二届(成都)年会上,就有人声色俱厉地提出了指责:“批日丹诺夫就是搞臭马列主义”,来势甚为凶猛。我当时就在场,我没有上台申辩,但却决定采取另一个更大规模的“反驳”行为,我清醒认识到,在我国学术文化界,之所以有不少人跟在日丹诺夫后面乱批、瞎批,而且不能容忍对日丹诺夫的质疑,其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对西方文学艺术、学术文化的实际客观情况根本不了解,或了解甚少,因此,我决定创办并主编一套以提供西方文学的客观资料(包括作品文本、作家资料、思潮流派有关资料以及时代社会、背景资料)为宗旨的丛刊。我是搞法国文学的,“各人自扫门前雪”,我这个丛刊自然就定为“法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刊”,其创刊号以萨特为唯一内容,这就是于1981年出版的《萨特研究》。

该书翻译了萨特三部作品与三篇重要文论的文本全文,分述了萨特其他八部重要作品的内容提要,编写了相当详尽的萨特生平创作年表与相关两个作家即波伏瓦与加缪的资料,报导了萨特逝世后法国与世界各国的反应与评论,翻译了法国国内重要作家、批评家论述萨特的专著与文章,而且我还写了长达两三万字的序言,《读书》上的那篇文章《给萨特以历史地位》成为该序的第一部分。整本书的篇幅近五十万字,构成了一本萨特的小百科全书。《萨特研究》出版后,大受读者欢迎,特别是文化知识青年的欢迎,一时颇有“洛阳纸贵”之势。

1982年,国内开始“清污”,萨特与当时流行的“蛤蟆镜”、“喇叭裤”被并列为三大“精神污染”,《萨特研究》一书在全国受到了批判,并被禁止出版,该书的序言更是一批“左撇子”猛烈抨击的目标,其批判文章之多,其用语之严厉刻损,实为文化大革命之后所罕见。

然而,中国毕竟是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时代,这样一个时代比过去那个时代之有进步,就在于开始有了若干自我调整的能力。事过一两年,雨过天晴,到了1985年,《萨特研究》又被准许重新再版。

这就是我“为萨特在文化上堂而皇之地进入中国而替他代办‘签证’”的客观经历,这个故事既是我个人的,也是公众的,它展现了近二三十年来中国学术文化领域的一个侧面,它反映了我们时代的真实,也启示着我们时代值得深思的真理。

钱:在中国知识界的集体记忆里,萨特的名字就是“存在主义”。作为西方存在主义哲学的重要代表,萨特真正进入中国,并非是他生前和终生伴侣西蒙娜·德·波伏瓦结伴而行的“中国游”,而是他身后在中国的精神之旅。对于我国绝大多数读者来说,第一次知道萨特这个名字,开始较了解其人其文的,恰恰始于萨特逝世那年(1980年)中国人写的一篇悼念文章《给萨特以历史地位》。该文出自阁下的手笔,为我国学界第一篇科学评说萨特的文章,这是存在主义作家萨特真正走进中国的先导。你在这篇文章里,从哲学、文学和政治三个层面给萨特定位,并卓有远见地写下了这段著名文字:“萨特的逝世,给一个社会主义大国的理论界提出了一个艰巨的研究课题。我们相信,通过对萨特的研究人们将不难发现:萨特是属于世界进步人类的,正如托尔斯泰属于俄国革命一样。”历史已经证明,这是多么正确的判断。时隔25年,重读你这篇满含热情的文章,我们仍然感到一种新鲜、亲切之感。惟其他不失新鲜现实的意义,这使我不免要旧话重提:存在主义为何物?萨特存在主义哲学的内核是什么?萨特哲学精神的本质特征和永恒价值(如果存在的话)何在?萨特的历史地位究竟是怎样的?所有这些问题对我国隔代的青年读者也不会是毫无意义的,是吧?

柳:诚如阁下所言,萨特真正意义上来到中国,是在80年代初,即他身后的“精神之旅”。不错,他于1955年与西蒙娜·德·波伏瓦曾访问中国,但那是他作为“社会主义阵营”范围之内的著名社会活动家被当作国际统战对象来到中国的。对于一个思想家与作家来说,如果他的主要“思想品牌”与“代表作”没有进入一个国家,那么不论自己去过多少次,那也谈不上是来到了这个国家,这就是比较文化学、政治、商务和旅游完全不同的标杆。不错,萨特的《存在与虚无》、《毕恭毕敬的妓女》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就翻译过来了,但我想,一个作家真正进入一个国家的主要标志应该是一定程度的本土化,至少是相当广泛的社会影响,可惜的

是,《存在与虚无》这部哲理代表作在中国翻译出版后,其影响微乎其微,我想通读过它的中国人,大概不到一万人,真正读懂了有所感的人恐怕就更少。说实话,这是哲学在社会传播上的天生局限性,即使在本国,一种哲理的广泛传播也还要靠通俗化、普及化,要靠有亲和力的诠释,18世纪法国的《百科全书》的历史功绩就在于普及了一个时代的思想学术研究成果,本国的文化传播尚且如此,何况现代法兰西一部艰深的哲学文本来到尚未开放改革的中国?把它翻译过来,前面加一篇短短的说明,声色俱厉地给作者扣几顶帽子,这怎么谈得上“他来到了中国”?至于把《毕恭毕敬的妓女》一剧翻译过来,与其说是介绍萨特,不如说此剧投合了当时国内“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政治标准,因为此剧并非萨特的代表作,与他的存在主义哲理精华完全“不搭界”,而是一部萨特作为一个“法共的同路人”带有反美情绪的政治宣传剧。

萨特是一个哲学家,也是一个哲理文学家,所谓的“存在主义”是他的本质标志,他的“品牌”,对待他的关键在于对待他的哲理,要把他引进中国,要为他办入境的“签证”,首先就要把他的哲理阐释清楚,使其“本土化”,达到一定程度的普及化,在中国这样一个对当时西方“关门闭户”的社会主义国家如何才能对萨特做到“引进”、以至“本土化”呢?我想至少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我在《萨特研究》一书的序言中所说的,要“撩开萨特那些抽象、艰深的概念在他的哲学体系上所组成的厚厚、难以透视的帷幕!”不作这一“撩开”工作,就无法使中国接近萨特,因此,我认为把一部枯燥艰深的《存在与虚无》往读者面前一放,是没有多大效应的,是在难为读者;另外一方面是要标出“入境”的“口岸”,“着陆点”,也就是本土对此“舶来品”的需求、与“舶来品”的契合,我在《萨特研究》的序言中指出,萨特强调个体的自由创造性、主观能动性的哲理,“大大优于命定论、宿命论”,“大大优越于那种消极被动、怠惰等待的处世哲学”,“不失为人生道上一种可取的动力”等等,都是有感于我们本土上世态人心的某些欠缺,而在指出此一“舶来品”的有用性、效应性。至于那篇序言着重指出萨特“在20世纪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荒诞条件下,发扬了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积极精神”,指出他“对马克思主义始终抱着一种善意的亲近的态度”,更是有意识在建立萨特与社会主义中国在意识形态上的共同点、契合点、融入点。

关于萨特存在主义哲学及其内核、特征与价值等问题,我想,首先应该指出,

萨特的确与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先师海德格尔、胡塞尔有承继的关系，但他有超越、有发展、有很大的不同，最大的不同在于他对人、对人的存在以及如何选择存在方式有更多、更深的关注，并形成了系统的哲理，更为不同的是，萨特不仅是哲学家而且更是文学家，他一生更多的精力是用于以文学形式去表现其哲理。文学形式与文学形象本身就具有独立而强旺的生命力与伸延力，足以将萨特的哲理演绎充实得更为丰富、厚重。因此，对萨特关于“存在”的哲理的认知与研究，就必须既通过其哲学论著、也通过其哲理文学作品，甚至后者更应是一条主要的途径。

按我的理解，萨特哲理的主要内容不外是：“存在先于本质”论、“自由选择”论以及关于世界是荒诞的思想，即认为：人生是荒诞，现实是令人恶心的，人的存在在先，本质在后，人存在着，进行自由选择，进行自由创造，而后获得自己的本质，人在选择、创造自我本质的过程中，享有充分的自由，然而，这种本质的获得和确定，却是在整个过程的终结才最后完成，等等。

不妨可以说，萨特哲学的精神是对于“行动”的强调。萨特把上帝、神、命定从他的哲学中彻底驱逐了出去，他规定人的本质、人的意义、人的价值要由人自己的行动来证明、来决定，因而，重要的是人自己的行动，“人是自由的，懦夫使自己懦弱，英雄把自己变成英雄”。这种哲学思想强调了个体的自由创造性、主观能动性。

特别要指出的是，萨特对自我选择明确树立了区分善恶的道德伦理标准，他区别了英雄的自我选择与懦夫的自我选择、人道主义的自我选择与反人道主义的自我选择，他这种努力在他的长短篇小说与哲理剧中，表现得非常明显。

毫无疑问，萨特的哲理具有其永恒价值，只要世界上还有人的行动、人的存在、人的选择这一类的话题，他的哲理就不会丧失其价值与意义，正如几千年前孔、孟伦理的至理名言，至今仍不失其光彩。

钱：你对萨特开拓性的研究，直接导致这位西方思想家、文学家被引入中国，直接引发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青年知识界的“萨特热”，从这一点看，你可是中国“萨特热”的真实“发动者”。萨特之入华土，及由此而形成的“萨特文化热”，无论从中外（中法）文学和文化交流史来看，还是从中国思想和中国学术发展史来

看，均堪称为一件意义深远的文化事件。它在接受人类优秀文化遗产方面，廓清了“四人帮”极左思潮所散布的迷雾，为拓展东西方的精神交流和学术发展扫清了道路；它进一步推动了国人本体意识的觉醒，为张扬人的主体精神，促进精神文明的提升和发展，提供了新的、有意义的“东方实验”。毫无疑问，亦如你所强调的，中国新时期的现实需要，是你研究萨特、与之“结缘”的契机，也是萨特入我中华的契机。萨特的中国之旅，在我看来，便是现代西方哲学精神和中国新的觉醒时代的历史遇合。那么，接下来顺理成章的问题是：萨特存在主义，这个西方的“舶来品”，萨特这位西方陌生的来客，何以成为上世纪80年代一代中国人所顶礼膜拜的文化偶像？在萨特那里，吸引当时中国读者的魅力和“热点”是什么？你作为引领萨特进入中国的“向导”和“萨特热”的见证者、甚至“发动者”，想必有更真切的感受和独到的体悟。

柳：的确，80年代初，中国出现了“萨特热”，今年，北京不止一家媒体在纪念萨特诞生100周年的时候，把当时的“萨特热”称为“80年代新一代人的精神初恋”，“整整一代人的青春故事”，在当时，其动静之大，当然会引起一些人士的侧目而视，将它视为“精神污染”。

“萨特热”，当然与《萨特研究》一书有关，此书起了引发的作用，但深层次的根本的原因还不在于这里，而在于当时的现实土壤与时代气候。如果没有深层次的根由，它是不可能引发如此大的“动静”的。

不妨把萨特哲理比喻为蒲公英的种子，即使蒲公英不靠任何助力能够自由飞翔来到中国，即使它有极强的生根发芽的能力，如果没有适宜的土壤，它便无法成活。当然，精神文化的种子，是以人心人性为基本土壤的，而萨特哲理则是以人的主体精神、人的主体能动意识为基本土壤的，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民族从根本上来说都不会缺少这种基本的土壤，只要有这种土壤，任何符合人性规律、符合人性精神需求的哲理，都有自己落地生根的可能。问题在于，在中国还没改革开放的时代，这片沃土是被冷冻着的，对于任何有积极效益、有强旺生命力的外来“蒲公英”来说，它只不过是“铁板一块”，既然连农民想自由料理自己宅前三分自留地的自由都不允许，还谈得上其他领域里的自由精神、自主意识吗？

终于，改革开放的春风使得冻土苏醒了，有了活力，这才使“蒲公英”有了发

芽生长的基本条件,这便是萨特在中国引起一阵热潮的根本原因。我们不妨说,中国的改革开放其首先的变化,就是个体的人自主自由的空间有所拓展,社会主义体制对个体自主精神、自主行为的限制与约束有所松动。这是一个关于主体意识、个性自主精神的意识形态与哲学哲理有施展空间、有可能大行于道的新时期,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很需要这种意识形态、这种哲理的新时期。而萨特哲理正是这样一种意识形态,特别是其“自我选择”的哲理,更是投合了很多中国人在不同领域、不同层面重新自我价值取向、重新标定自我定位、重新选择自我道路的精神需要,而当时那位“推销员”也的确把“自我选择”的哲理阐释得很充分很突出。总之,《萨特研究》恰逢一个“自我选择”的“盛世”,赶上了这班大车,自然也就风行一时了。

因此,如果说萨特哲理有什么能深深吸引中国读者的话,首先就在于它具有的这种最为根本的人文哲学的思想性质。

当然,萨特之吸引人,还不仅仅在于他的哲理的本质特征、精神素质,他的确有若干很动人的“魅力”。作为哲学家,他有极强的思辨能力、抽象能力与深掘能力,他的说理与逻辑足以在学术上令人叹服,他也是一位哲理警句大师,善于把哲理凝聚在隽永的表述中,如“存在决定本质”、“英雄的自我选择决定英雄的存在”、“懦夫的自由选择决定懦夫的存在”、“他人就是地狱”等警句,在中国曾为整整一代青年学子津津乐道。

萨特比一般哲学家远远强有力的一个方面是他有杰出的文学才能。他不仅拥有哲理思想的力量,而且也掌握着感性形象的力量,他的哲理所有的“要义”、“要点”,都通过他的小说作品与戏剧作品有饱满而富于感染力的表述与演绎,反之,他几乎所有的代表作都蕴藉着深刻的哲理而具有超凡的思想品质,在他身上,哲理与形象水乳交融,相得益彰,这是他充满魅力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在文学上基本上都是采用传统的形式,并使之达到经典的高度,以保证他的思想内涵与精神哲理得到清晰、饱满、完美的呈现与表述,他一般都不让形式上的标新立异、荒诞不经的因素来干扰他的呈现与表述,所有这些就构成了他所特有的综合魅力。

钱:根据我个人的体验和认识,勃兴于一时的中国“萨特热”,主要是中国接

受者(作家、批评家、译者和读者)向思想家、社会活动家萨特的一次逼近,着重吸取的是其思想、政治的一面,而非文学的一面,为中国人接受外国作家、外国文学所惯有的思想模式。中国“萨特热”,究其实,是萨特思想启动、中国知识界积极参与的一次思想解放思潮在东方的生动演练,其如火如荼的程度,使之带有浓重的政治色彩和群众性思想运动的性质,激情四射,热闹非凡,但真正沉淀下来,耐得起时间咀嚼的东西并不多。这就是为什么不少当年的“萨特迷”们,在激情消退、事过境迁后发出如此感慨:萨特只是构成他们一代人“精神履历与青春回忆的要件之一”^①,已经远去了。而萨特及其存在主义,只不过是留在他们记忆中的一种曾有的时尚话语和超级热词而已,如同今天人们言必称全球化一样。甚或有些媒体将80年代中国知识界与萨特“结缘”的精神初恋,视为一次“错爱”,称:与萨特的哲学“结缘”,“只可一宿,不可久眠”。^②对此,你有何见教?你作为中国学界带领读者走向萨特的第一人,当有自己的思考和认识,是吗?萨特对于当今的我们,是否已经过时?这位东渡的西方思想家到底给了我们什么呢?

柳:阁下上述一番话,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归结起来就是这样一个问题:萨特在中国的影响究竟范围有多广,深远度有多大,时至今日,他在中国的影响是否还存在?

诚如阁下所指出的,萨特哲理在一代人的记忆中曾留下了“时尚话语”与“超级热词”,我想这应该是指“自我选择”。应该承认这个“话语”,这个“热词”时至今日仍很流行,具有很高的被使用率,人们在回顾自己某一次由个人主体意识来定夺的经历时,常使用这个词,在陈述自己将要由个人主体意识来定夺的计划时也常使用这个词,总之,用来概述自己主体的一种精神状态、主体精神的一种价值取向与行为决断,因此,它就不仅仅只是一个“话语”,一个“词”了,它有其内容,有其价值观,有其时代历史、社会现实的丰富内涵。我不能说,使用这个词的世人都读过萨特,都受过萨特的影响,但至少说明,当年的萨特热多少留下一些东西,说明萨特哲理的确有其广泛的涵盖性,有其强烈的能引起精神共鸣与精神通感

^① 何力:《一段精神履历的要件》,《经济观察报》,2005年7月4日。

^② 曹红蓓、段京蕾:《80年代新一代的“精神初恋”》,专题《错爱萨特》,《中国新闻周刊》2005年第19期(总第229期)。

的机能,因此,即使是没有读过萨特的人,在利用自己所获得的空间与条件自行其是的时候,也可以借用“自我选择”这样一个话语。在我看来,有广泛涵盖性,能引起精神共鸣与精神通感而有被广泛借用功能的哲理,正是最有生命力的哲理,是不容易过时的哲理,何况在使用“自我选择”这个词语的广泛人士中,的确有不少人当年是读过萨特,至少是知道萨特的,只不过他们当年通过“自我选择”的行为方式,后来,获得了自己非哲学、非文学的“存在”,成为了CEO,或成为了经济师,或为有官职的人……

至于当年热衷于读萨特的人,很多人后来都在学术文化领域里有所作为,不少人已经成为了名士,他们都是从萨特这所学校里出来的。很难想象,一个当年对学术文化感兴趣的人是不曾读过萨特,不曾热衷于萨特的,萨特曾经真可谓是他们的“精神初恋”。但是正像现实生活中,初恋往往并不导致结婚一样,热衷于萨特的人,日后往往并没有成为“存在主义者”、萨特主义者,不过,那么多人有那么一次“精神初恋”,有那么一个“青春故事”,对于一种哲理,这就足够了,这就是它优质的标志。

至于当年的“萨特迷”,有些人激情消退,甚至有了“只可一宿,不可久眠”之叹,我的看法是,不论这些人当年热衷于萨特还是今年发出了“只可一宿,不可久眠”之叹,都是他们自己的自由,都是他们自主的“自由选择”(我还强调一句:这些都是他们的“自由选择”,这些都是他按“自由选择”的法理办事的结果)。何必一定要某个人、某些人信奉萨特终生、咀嚼萨特终生呢?任何一种哲学,哪怕是其现实权威强大得如太阳的哲理,也没法将所有的人都拴在自己的身边,不许离去。当年某些热衷于萨特的人后来又作了其他的“自我选择”,比方说,选择了其他的安身立命之道,选择了其他的门庭,其他的路子,例子确是屡见不鲜,有的人又自我选择了解构主义,有的人自我选择了侍奉德里达,有的人则自我选择了仕途或商海……这都很正常,人们不是常说“世界是丰富多彩的”、“世界是多极多元的”吗?重大的哲理主义,也不过是一个有吸引的“精神展台”而已,不时有人围聚起来进行观摩、参悟、玩赏、膜拜,不时又有人散去,时聚时散是正常不过的,但这种现象与这一哲理是否无用了、是否“过时了”的问题是两码事,而萨特的“自我选择”论,作为一种具有积极自主精神、创造进取精神的哲理,应该是不会过时的,不会沦为无用之物,因为只要有人类的主体意识取向、主体实践活动存在一

天,人们就会对这种哲理有所需求,就会对这种哲理感到亲切。因此,我相信,萨特这个精神展台前面的人群肯定会聚聚散散,散散聚聚,但绝对不会荒无人迹,今年,正值萨特诞生100周年,虽然有人弹出了似乎带有些微“左”味的“错爱萨特”的高调,但竟有如此多重要的媒体为萨特献出了如此多的篇幅,就是一个明证!

应当承认,近几年,在中国,读萨特的人少了,与当年的盛况相比,相差远矣。这个“精神展台”的前面,大有冷落之势,倒并不是因为萨特丧失了固有的魅力与价值,而是因为社会现实有了变化。首先,改革开放已经有一些年头,人们在政治法律规范所允许的范围里已经得到了进行自由选择的自由,改革开放之初,全社会范围内那种急切要求实现个体意识、个体决断的情结已经大有释解,而且经过自由选择有所作为、有所成功的个人比比皆是,人们在现实的生活就能够得到启发、找到典范,并由自己来付诸实施,那又何需一定去请教萨特?总之,社会群体,包括知识学术群体对哲学的需要大大降低了,这是最深层的根由。还有一个重要的千万不可忽视的社会原因,那就是我们正处于一个物质功利主义大张扬的年代,人们都忙于赚钱、谋求功利的目的,大家都很忙,没有多少时间读书,特别没有多少时间读严肃的书、令人深思的书、人文的书,流行的文化形态是“快餐文化”、“娱乐休闲文化”、“看图识字文化”,在整个人文精神失落,人文文化影响缩小的大背景下,比萨特更有经典地位的思想家、作家被冷落尚且不乏其人,何况萨特?

钱:萨特是法国20世纪精神文化领域的巨子,是一位具有世界意义的大家,这是你给这位大家在人类文化坐标史上的定位。萨特在中国的精神之旅,不管有怎样的际遇和潮涨潮落,这个历史定位都不会有什么变化。可创造自己体系的思想家、文学家的萨特,他的精神谱系何在?我是问,他的哲学体系、文学创造和西方精神传统的关系何在?他的文学创作和哲学思想有着怎样的关联?记得1994年“萨特热”潮落后,中国法国文学研究会在你主持下举行了“‘存在’文学与20世纪文学中的‘存在’问题”的学术讨论会,就此进行了深入的探讨,1997年同名论文集出版,列入你所主编的《西方文艺思潮论丛》第7集。请说说你的看法好吗?

柳：关于萨特的哲理属何“精神谱系”，按我个人的理解，简而言之，可谓存在主义之名，人道主义之实，他的哲理可视为有存在主义之名的人本主义、人道主义。

说萨特是存在主义，原因不难理解，因为他是学存在主义哲学出身的，他早年留学过柏林，师从胡塞尔，研究被称为存在主义的德国哲学，他早期的哲理著作《存在与虚无》遵循了胡塞尔、海德格尔的套路，可以说是一部存在主义的专著。但是，当萨特以其文学创作成名之后，在1943年左右，加布里埃尔·马尔塞给萨特的文学创作贴上了存在主义的标签，不久后，萨特在一次讨论会上，却明确予以拒绝，宣称“存在主义，我不知道此乃何物”。这是怎么回事？我以为问题出在萨特早于出版自己的存在主义哲学专著之前，就已经在文学界崭露头角，有了相当大的名声，出在他的哲学专著与他哲理文学作品之间的非等同性。

德国存在主义哲学有自己的理论范畴，如对人类生存生命定性的阐释、存在与时间的哲理、生存哲学、生存哲学现实论、关于存在与超越的理论、对现在、境遇与瞬间的论述、真理的多重性、宗教价值的超验性等等。萨特作为一个德国存在主义哲学的青年研究者，当然会要面对这些问题，但是，他作为一个创作了《苍蝇》、《间隔》等一系列文学作品的著名作家，他在创作中所面对的就是另外一些问题了，即使是哲理，他想要在作品中表达的与他所能表达的，当然会有所不同。他是以文学作品而不是以他的哲学专著成名并享有巨大声誉的，而他在文学作品中所着重表达的哲理正是我们所看到过的，即“存在决定本质”、“自我选择”等。

正因为他在自己的作品中所表述的哲理与原本的德国存在主义哲学有所不同，所以当批评家把存在主义的标签贴在他那些已经风行的文学作品上时，他自然就会予以否认。然而，存在主义文学这个标签已经成了时髦标志，加以热衷者的鼓噪与炒作，使得萨特也难免心动（要知道，他一生都惯于追求某种轰动效应），他终于接受了这面大旗，充当了它的旗手，于是，“存在主义文学”成为了一个正式的牌号进入世界文学史，并且风靡一时。这便是我们中国人所面临的文学史既成事实，说实话，这造成了我们在理解上的某种困惑，因为按我个人的理解，萨特在其文学作品所集中表现的“自我选择”、“存在决定本质”的哲理与其说属于哲学认知与理论解析的范围，不如说是属于伦理学人生观的范围，如果说存在

主义哲学仍是对世界的认知与描述，那么，被称为存在主义文学的那一部分文化精神成果的哲理内涵，则是对人生的清醒认知、彻悟意识、态度立场与形象展示，用简单的话来说，就是有关人的一种人生观，在根本上，这种思想哲理内涵显而易见是属于传统的人道主义体系、人本主义体系，是这种思想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一个“部类”，只不过它使用了存在主义哲学的某些概念与术语，如“存在”、“本质”等。

萨特本人一定是感到了存在主义哲学体系与自己文学作品中哲理的非同等性，而他本人又不无尴尬地完全接受并享用了存在主义作家这样一个带有光环的称号，为了弥合这种理解与认知上的裂痕与距离，他在1946年，他的“存在主义文学”已经大行其道、风靡全球之时，出版了《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一书，此书后来被称为“存在主义圣经”，应该说是萨特对自己精神谱系的最具有“拍板定案”作用的阐释。总之，在我个人看来，萨特仍然属于人道主义思想的传统，而他所作的“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的解释，完全值得我们尊重。

钱：作为20世纪西方精神文化领域的巨人，萨特在文学、哲学、政治社会斗争等诸方面都有自己的建树和贡献，他留给后世的精神遗产是丰富的、多层面的，我们接受萨特这份精神遗产，自然也不限于哲学、思想、政治层面。对萨特的接受会因接受者不同、时代境遇不同而呈现不同的层面和重点，永远受制于接受者的取向和时代的变迁，是个十分复杂的课题。面对这位集哲学家、文学家和社会政治活动家于一身的“丰富复杂”的萨特，我还是要问：你作为研究法国文学和萨特的权威批评家、萨特的中国接受者，更喜欢更看重萨特的哪一面？也就是说，在萨特一生的劳绩和创造中，你个人觉得哪一份最重要？最有价值？对中国人来说最有意义？

柳：的确，萨特留给后世的精神遗产是多方面的。阁下指出，“对萨特的接受永远受制于接受者的取向与时代的变迁”，我很同意，至于我对萨特哪个方面更为看重，更为喜欢，既然我是一个文学研究工作者，自然对他的文学成就更为看重，更感兴趣，说到“喜欢”，很坦率地说，萨特并不是我最喜欢的外国作家，在我喜爱的程度上，加缪就排在他的前面，但作为一个研究者，我有责任对他本人、对

他的各个方面作出公正科学的评价,最好是符合中国国情、适合当前文化发展阶段与状况需求的评价。

萨特是学存在主义哲学出身的,他作为那个谱系里的一个哲学家,应该说是很出色的,可谓青出于蓝,他所表现出来的思辨力与抽象力是令人赞叹的。他也写出了两部纯理论的哲学专著,不过,这些专著即便在法国,也只是写给高层次的业内人士看的,正像博士论文经常是写给评审委员会看的一样,对一般读者来说,完全是“阳春白雪”,“曲高和寡”。其中有一两部译成了中文,据我所知,读者甚为稀少,如果不是对思辨与抽象有割舍不了的热情,一般读者是不会去问津的。

萨特一生在社会政治斗争、思想文化活动方面倾注了很多精力与热情,他大量的政论文就是他在这个方面的产物,收编为《境况种种》,共有十卷之多。1981年10月我在巴黎拜访西蒙娜·德·波伏瓦的时候,我问她对萨特在精神文化几个不同方面的贡献有何看法时,她特别强调了萨特本人对这一套文集的高度重视,波伏瓦也认为它是人类宝贵的思想财富。但是,在我看来,时至今日,如何评价萨特的政治社会活动与相关成果,反倒成了一个问题。我们知道,萨特作为一个政治社会活动家,除了早年参加过若干反德国法西斯占领的活动外,后来,在国内主要是以法共甚至是极左派的同路人的身份,而在国际上则主要是以社会主义阵营的斗士的姿态,在80年代初我为萨特在思想文化上堂而皇之进入中国“代办签证”时,曾经大力介绍了他作为大左派的倾向与表现,那是为了取得社会主义中国对他的认同,也是为了消减些许“左”派批评家射击的火力。现在,经过了二十多年的世事沧桑,当人们对很多事物愈来愈持理性的态度的今天,就有必要指出萨特当年不少姿态与表现是经不起历史检验的(如像,他所发动的对加缪的抨击与责难)。他曾热衷于卷入一次次斗争或事件,凭借他的声望与才华,信仰与自信,投入得太执著、太淋漓尽致了,丝毫没有给自己留下一个作家最好应该保持的适当距离,没有采取一个思想家最好应该具有的高瞻远瞩的超然态度,倒把自己的阵营性、党派性(虽然他并未正式参加法共)表现到了最鲜明不过的极致程度,因此,当他所立足的阵营与党派在历史发展中露出了严重历史局限性而黯然失色、甚至成为历史陈迹的时候,人们就看到了萨特振振有词、激昂慷慨所立足的基石,所倚撑的支点悲剧性地坍塌下去了,看到他在那个地方所投入

的激情、岁月、精力、思考、文笔几乎大部分皆付诸东流。

在文学上,萨特是真正意义上的巨人,他在文学史上地位稳固,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具有长存的经典的意义。他雄浑的力量在于把自己的“存在”的哲理与现实生活形象水乳交融地结合在一起,以清晰鲜明的古典文学形象表述了发人深思的现代思维内容,创造了一系列既有形象感染力又具有深邃意蕴的杰作,他这种“双结合”的优势是很多20世纪作家所不具有的,他表现了“存在”哲理的寓言性戏剧与同时具有丰满生活形象的小说作品,不仅其深刻隽永的内涵足以令人反复思考,回味无穷,而且其纯净的经典式的艺术形式则足以给不同时代的人提供巨大的美感享受,即使是他的一部分时事针对性特别强烈的“境况剧”,也并非一概“过时”,倒由于历史社会事态的发展而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如他揭露法西斯残余势力的《阿尔托纳的隐藏者》,在当今欧洲又出现纳粹幽灵的时候,就仍有其现实意义。萨特在文学理论方面的建树是很卓越的,对我们有很高的研究借鉴的价值,至于他多种具有深刻哲理的传记作品,则像藏量丰厚、但至今仍未被开采挖掘的巨大矿山。他的自传《文字生涯》篇幅不长,价值很高,可与卢梭的《忏悔录》比美,其严酷的自我剖析精神堪称典范,显示出了作者独特的人格力量。

钱:研读你有关萨特的文章,倾听你对这位大家创造业绩的考量,你更看重的显然是文学家萨特,你把他列于法国20世纪文学史大师的地位,他的世界性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回顾萨特流入中国的历程,文学家萨特——确切地说,作为思想家的文学家萨特——对中国新时期文学发展的冲击和影响是有目共睹的。正如有些研究者所指出的:“当作为哲学家的萨特在中国的思想研究领域里日益退后的时候,萨特在文学、艺术领域的启蒙作用则表现出更为持久的影响。徐星的厌倦孤傲、刘索拉的青春躁动、格非、潘军、残雪、谌容、朦胧诗人……透过一份被批评整合过的受萨特影响的作家名单,你会发现,过去20年中国文学的新变,已经无法离开对萨特的评说。”^①这是中国作家对萨特文学层面的接受,虽然在人数上和规模上远不如当年“萨特热”的精神鼓噪那么普泛、宏大,但它到底留下了一些耐人咀嚼的东西,表明通过文学的交融而获致人的心灵情感的汇通,永远

^① 何力:《一段精神履历的要件》,《经济观察报》,2005年7月4日。

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萨特思想的滋养给中国新时期作家、艺术家以新的灵感、新的视野、新的题材和新的表达方式,这是不争的事实,它已成为今日大学校园里不少年轻学子攻读学位的选题。试问:萨特给予中国新时期文学的这种影响,是思想家萨特的作用,还是文学家萨特的作用?抑或两者共同作用的结果?换言之,中国作家对萨特文学层面的接纳,主要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学滋养,还是萨特哲学精神的启迪?

柳:阁下是研究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的,对法国文学与当代中国文学相互的双向交流、双向影响很有见解,可惜的是,我个人的研究是单一领域的,我研读中国当代作家的作品甚少,不敢对你所列举的那些中国作家与萨特影响的关系发表意见,与其信口开河,不如自认“不知为不知”。不过,从萨特这一方面来看,我认为他影响当代作家的方式与途径不外有二:

一是以他的哲理内涵,他的哲理与传统的人道主义、人本主义相通,对于任何有人文关怀的作家都会具有亲和力,而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国作家,是不缺人文倾向的。他的哲理具有现代特征,运用了现代哲学的概念与术语,对于憧憬现代倾向,对现代性颇为好奇、感兴趣的当代中国作家是会有强烈吸引力的。

二是以其将现代的哲理与古典的文学形式熔于一炉、水乳交融的方式,也就是说他给中国作家提供了哲理文学的范例,这种文学的形象鲜明性与思想隽永性,足以对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作家有强烈的吸引力,并构成可以效仿的典范,如果说,在这个时期的中国出现过哲理文学作品或带有哲理色彩的作品,也许就与萨特的影响不无关系。

除此二者之外,萨特对当代中国文学的影响就不大可能有其他的切入点了,具体来说,不可能在文学形式与表现方法上给中国作家提供什么新的灵感,原因很简单,因为萨特没有什么新文学形式,他不像“新小说”派、“荒诞派”戏剧,他的文学表现形式基本上是传统的、古典的,他的戏剧形式中国作家早在易卜生那里就见识过,而他的中短篇小说形式,与莫泊桑、契诃夫的小说基本上属于一个类型,只有他的中篇《恶心》在形式上有点“各色”,但那篇小说的可读性实在很差,我想,相当注重可读性的中国作家不会有兴趣去仿效。

钱:在我看来,在萨特那里,哲学家、文学家是二而为一,或思想家、文学家、社会政治活动家是三而为一,互为补充、互相制约的整体,他在创作上的一切特点、风格和追求,都是和他这多重身份、层面紧密相关的,很难截然分开。在对萨特的评析中,我特别注意到你对萨特自传中的人格魅力的分析和对他作为“作家兼斗士”的强调和评价,我认为,这种既是文学层面、也是思想层面的分析和评价,捕捉到了萨特其人其文的本质特征,其价值取向也直接承继了中国作家接受外国文学的一种传统精神。其实,在法国文学史上,许多在文化上有重要建树的大家,大凡都是“作家兼社会斗士”的角色,很政治化的,几乎形成了一个文学传统,从伏尔泰到卢梭,从左拉到法朗士,从纪德、罗曼·罗兰、马尔罗到萨特……而中国新文学作者,从鲁迅、茅盾到巴金、胡风、路翎……在接受外国(法国)文学滋养时,不仅致力于学习外国作家为文的本领,也十分注重学习他们为人的风范,也几乎形成了一个接受传统,所以你对萨特文格和人格力量的强调和评价是十分有意义的。

柳:一个国家的文学中能形成某一种文人传统、作家传统,是这个国家文学丰富与成熟的标志,并非任何一个国家的文学中都能有此“景观”的,一般来说,是在某种历史相对悠久、内容相对丰富和厚重、发展相对有持续性的文学中才会有,法国文学就是这么一种文学。也许,在法国文学中,能称得上传统的东西不止一项两项,比如说,对创新精神的强调,对哲理的重视等,当然,作家关注并介入社会生活,要算是法国文学中较重要的一个传统。

阁下列举了这传统中一些令人瞩目的作家,我很同意。这些作家不只是一般地关心社会现实、民生疾苦,也不只是一般地“指点江山,挥斥方遒”、介入社会政治。他们的介入往往有声有色,甚至轰轰烈烈,常常为了某一个正义的目的,敢于站在当时统治阶级、以至整个国家机器的对立面,进行勇敢的抗衡,如雨果为反对拿破仑第三的政变与独裁,流亡国外达19年之久,不作任何妥协;左拉为了德斐斯冤案的昭雪,敢于冒监狱之苦与生命危险,等等,这些作家以其轰轰烈烈的正义之举而在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萨特显然是很景仰这种勇者的辉煌,他十分有意识、十分自觉地将作家的这一种行为方式,这一种存在形态,提升为一种道德职责、一种美学规范,而大加阐

释,建立了“介入文学”论。他自己当然是这种理论、这种理想的实践者,而且也达到了相当轰轰烈烈的已成事业的规模(即使较伏尔泰、雨果、左拉稍逊一筹)。他在其中也表现出了很令人钦佩的勇气,如像他反对阿尔及利亚战争的时期,受到了右派要“枪毙萨特”的威胁后,仍坚持斗争;又如他在匈牙利事件中抗议苏联出兵,采取了断然决裂的态度,不惜公开否定自己长期作为苏联之友的历史,而这种敢于否定自己的勇气似乎更为不易,没有一定的人格力量是做不到的。

不过,应该看到,法国文学中之所以能形成“作家兼斗士”的传统,是与法国社会民主化的历史较早、民主化程度较高这一历史条件有关的,萨特之所以能把自己的“介入”理论扮演得淋漓尽致,也是与戴高乐总统的雅量有关,他曾明令:“我们不要去抓伏尔泰”。各个国家有各个国家的历史社会条件,不同国家的作家也有实现人格力量的不同的道路与方式,如果不考虑本国本民族的客观条件,硬要抄袭或照搬地去学,那肯定是学不来的,甚至往往会反受其害。

钱:我们就“萨特在中国”所进行的讨论和交流,差不多已接近尾声。请容许我提一个知识性的、近于幼稚的问题:萨特这位业绩卓著、风格鲜明的作家、思想家,这位西方明星式的大知识分子,在他生前和身后,何以在西方和东方不断招惹是非,引起争议?世人对他的臧否如此分明,在法国作家中实属罕见,这是因为他思想深邃复杂、风格鲜明独特所致?还是他追求明星效应的个性所致?

柳:萨特是一个既得到过大欢迎、大赞赏、大崇拜,也得到过大非议、大厌烦、大否定的作家,他得到什么,要视他面对何种人群而定。在上个世纪50、60年代法国以至整个西方世界的文化青年面前,他是一个被热烈崇拜的对象,一个完完全全的文化偶像,在60、70年代法国乃至西欧极左派青年面前,他是一个精神导师。在法国以至西方的传统社会阶层与右翼社会群体那里,他被视为一个喜欢骂街的人,一个叫人心烦的人。而在东方,在社会主义中国,他的“自我选择”说又曾被视为瓦解集体主义的“精神污染”。他之被赞颂还是被否定,与其说主要是由于他个人的主观原因,不如说是不同人群的不同立场与喜爱。当然与他的主观表现也有很大的关系,如果他只是一个哲学家、一个小说家、剧作家,他不至于引起这么大的争议,问题在于他是热衷于社会政治、热衷于政论时评,他的实践活动与

批评议论不可能不触动不同方面、不同阶层的利益与神经。加以,他是一个个性张扬的人,喜欢追求轰动效应,也善于制造轰动效应,如发表宣言、上街游行、探访监狱、拒绝领奖等等,这样张扬、极致、尖锐的表现形态,当然很容易招致中国俗语“树大招风”所说的那种后果。但我想,对于头上有光圈,口袋里有法郎,没有家庭与儿女的拖累,毫无后顾之忧的萨特来说,也许他图的正是这个。

钱:回顾萨特在中国的精神之旅,谈论萨特在中国的被接受,是个沉重的话题。你是这个话题必不可少的“焦点人物”,甚至在一个时期,你本人成了人们议论的中心话题。上世纪80年代,你引领萨特进入中国,便一度 and 这个招人喜爱而又招惹是非的外国人,一起成了中国青年和学界议论的中心话题,20余年后萨特百年诞辰的今天,人们又一次把你请出来,置于萨特话题的中心:请你向新一代读者讲述萨特一生的峥嵘岁月,重温萨特中国之行的风雨历程,重估萨特在中国的影响和意义。国内各大报刊相继刊发采访你的文章,首都数家出版社也纷纷重版你所开启的萨特译介、研究的多种著作。梦回星移,世事沧桑,萨特在中国的命运真是今非昔比,这使我们这些亲历者、见证者,不免感慨万端。请问,面对这个巨变,你的感受是什么?是苦涩还是欣慰?

柳:《萨特研究》问世至今已近25年,今年,萨特诞辰100周年之际,各大报刊的纪念盛况令人大感意外。两卷本的《萨特精选集》(北京燕山出版社)与七卷本的《萨特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出版,也表明萨特精神遗产已经正常而顺畅地在中国通行。眼见改革开放所带来的这一番文化景象,我作为一个当事人备感亲切与欣喜。想当年,《萨特研究》问世之后不久,我的确受到过很大的压力:大会上的点名,报刊上的批判,严肃的个别谈话,书被禁再版,等等,最后,我总算坚持了自己的学术观点,没有去遵命写领导上命题的反省文章《我对萨特的再认识》,当然,我也付出过若干代价,但至今回顾起来,却并不感到苦涩,我深深感到,自己能参与“萨特的中国行”这样一个文化进程,在这个过程有所作为,也算是“生逢其时”的一种“造化”,对此,我感到欣慰。